

# 對歷史社會學的幾點思考

顧忠華（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 壹、前言

目前在學術分工愈益專門化的趨勢下，知識領域的探索往往追求專精而非廣博，而學科之間的疆界（boundary）愈益明顯——這反映在大學分科教育上，意味著學習者不只被教導熟悉專業性的技術、方法、理論，同時也不斷被強化以「本行」的問題意識、思考模式乃至立場觀點（perspective）從事研究分析。從此一角度而言，哲學、歷史學、經濟學、法律學和社會學等等學科雖然同以研討人類生活經驗為己任，但所注重的面向與研究對象的選擇多在「專業本位」的引導下愈分愈細。即使有「整合」的企圖，與其說有「科際」性的最高層次綜合，不如說其重疊部分更可能發生於各門學問的次領域（subfield）。歷史社會學正如社會史般，乃是社會學與歷史學分別就其本位將彼此重疊的知識成份，再予以「解構—重組」過程下的產物。我們因此不難理解，類如將歷史社會學定義為「應用社會學已建立的方法概念和架構並運用歷史文獻與物品，去探究社會學者絕對無法身歷其境的社會」（章英華，1983:215），或宣稱社會史不僅豐富了歷史研究內容，「還把從歷史學科分離出去的歷史成份收回來」（馮爾康，1988:21），同樣反映了知識系統內部重新整合的努力。本文將只陳述歷史社會學由模糊到自覺地成為社會學分支之一的發展經過，並反省其可能性與必須面對的限制。

## 貳、歷史知識與社會科學

德國史學家 J.Rusen 曾特別強調歷史知識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連性（1982）。事實上，任何存在高度文明的地區，紀錄、分析和詮釋歷代先人之遺業（heritage）始終構成人類認知活動的主要領域之一。中國由司馬遷以降的史學傳統，就史料的收集編纂來看，不愧是人類歷史活動最龐大的資料庫。而西方史學的特色，則並不在於史籍寫作技術上的功夫，毋寧在於其近代以後伴隨西方社會變遷所產生的一種歷史思考（historical thought），以及逐步漸進的歷史知識學術化趨勢。

早期歐陸哲學家如 G.B.Vico（1668-1744），J.G.V.Herder（1744-1803）和 G.W.F.Hegel（1770-1831）首先將歷史本身動力的了解由神意論轉換

到正視人類行爲之結果。J.G.Droysen (1808-1884) 繼而主張史學的自主性，開啓十九世紀盛極一時的「歷史主義」之先河。「歷史主義」所關切的重點，可概括爲「如何將過去先行發生的事，以及那些仍存在現今生活界中的特質，轉化爲有過去史蹟爲證的，真正歷史性的過去」（胡昌智譯1986:xix）。此一思想運動雖提高了史學的地位，但其末流衍生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亦形成內在的緊張與危機，同時刺激了新一代學者提出更周延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用以超越「歷史主義」將一切化解爲歷史產物的盲點（李弘祺，1981 a,b）。其中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貢獻實亦奠下將歷史知識納入社會學學問領域，進而融會出歷史社會學特殊觀點的重要基礎。

基本上，韋伯本身所受的訓練可歸入「日耳曼法律史學派」。他的博士論文以中古商社發展史爲題，探討的問題觸及一個時代的法律究應如何「歸責」（Zurechnung, responsibility）到先前存在之社會事實——他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見解有不少便是根源於他早期從事法律史研究的心得（Zingerle 1981）。在韋伯看來，我們去探求某種歷史文化現象的因果關聯，並不能完全依恃自然科學的因果觀，因爲由認知目的和認知的對象的性質上，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Kulturwissenschaft）不盡相同。自然科學面對的不是「價值世界」，其使用法則性知識（nomological knowledge）兼有妥當性與客觀性的保證，而能夠藉助因果法則來解釋（explanation）自然現象。相對地，文化科學必須先透過研究者個人的「價值關聯」（reference to values）來建構（construction）對象——例如基督教文明，資本主義等「歷史個體」（historical individual），並且歷史文化現象具有時空情境的獨特性，在異時異地的研究者必須透過「瞭悟」（understanding）的方法去權衡這些現象在歷史脈絡中的「文化意義」（Kulturbedeutung）。但是，韋伯不完全同意新康德學派如H.Rickert等人逕認爲文化科學乃追求表意性知識（ideographical knowledge）從而落入主觀主義的陷阱。歷史社會學因此不只要求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進行抽絲剝繭的「因果歸責」工作，還進一步主張藉助經驗規律推論出「客觀可能性判斷」（objective Moglichkeitsurteile）——雖然歷史乃一切發生過的事，並無所謂的「可能性」可言，然而在運用概念來掌握歷史過程時，其所涉及的只是思想建構之意義關聯（即理念型 ideal type），因此必須訴諸客觀合理的「可能性」以判斷其是否妥當（翟本瑞1985：109）。

由於在方法論上初步解決了「歷史個體」作爲研究對象的邏輯問題，韋伯本人放手從事歷史社會學的實質研究。從「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05），「古代農業關係」（1909），到「儒教與道教」（1915/1920）等等著作莫不體現他結合大量史料與社會學分析的努力。對後人而言，韋伯這方面的成就始終仍具有指引和啓發的作用。

## 參、歷史社會學的後續發展

不同於社會學的古典時代，二次大戰後當代的社會學發展有了很大的轉折。配合著調查統計技術的突飛猛進，主流社會學一度在「行為科學」(behavior science) 的名義下，集中焦點於當前社會現象的經驗研究 (empirical study)，而相當忽視歷史社會學的研究領域。除了少數作者如 R. Bendix (1978)，S.N.Eisenstadt (1969) 和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下的 E.J.Hobsbawn，E.P.Thompson (參見 Kaye 1984) 之外，社會學謹慎地不去關切歷史的事件與問題。用 N.Elias (1987) 的話來說，這是社會學家「退卻到眼前現在」(retreat into the present) 的策略，但他預言這並不見得能幫助社會學完成其真正任務，也就是將人類社會共同生活形態的成因及其結果一一剖陳出來。事實上，經過長久對歷史經驗的忽略，在社會學本身亦造成了反彈的力量。八十年代開始，一連串自覺地運用歷史與比較方法的社會學專著接踵而出，「歷史社會學」的方向因此逐漸受到重視。艾森斯塔認為在當代總體社會學 (macrosociology) 的研究中，歷史社會學佔了不少份量，他同時歸納出三個主要重點 (Eisenstadt) 1987：1. 企圖運用歷史資料整理出近代「國家形成」(Nation-Building) 的社會過程。如 Th. Skocpol (1979) 分析比較了法國大革命以及蘇俄和中國在本世紀經歷的社會革命；2. 注重各文化個體之間的交流及其影響，開始以更廣闊的眼光強調地緣相對位置對人口遷移、科技發展和社會變遷的作用。又如 D.Chiot (1985) 由歷史的角度來檢討西方興起的結構性條件。(我們若考慮到法國年鉴學派的衝擊，則 I.Wallenstein 的世界體系模型亦可歸於比類)；3. 近來對韋伯學說的重新詮釋，激發了學界對「理念」在世界史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的討論興趣。這涉及到宗教、文化的歷史社會學分析，而且不光探討大傳統，還須顧及到「異端」(heterodoxie) 和創新之間的關係。許多圍繞著「理性化」、「理性主義」概念進行研究的作品，如 Schluchter (1981)、Kocka (1986) 等更釐清了這些概念的實質含義。總括艾氏的觀察，歷史社會學目前納進了不少極其富潛力的研究領域，而且在觀點運用上展現出下列特色：

1. 誠如 R.Aron (1984) 所言，當代的世界觀已不再訴諸目的論式的歷史哲學，也放棄了以單純演化論來解釋歷史。多元演化、多因素分析的架構顯然較符合歷史文化本身的複雜性；

2. 在省思人類整體的處境上，歷史社會學今天已超越「現代化理論」的框框，朝向以「開放性」的角度來描述變遷；

3. 歷史社會學的比較方法，促使研究者廣泛考察各大文明共通的制度結構—宗教、城市、權力中心等等，並深入探尋社會特定團體承載的物質和理念之利害關心 (material and ideal interest) ；

4. 歷史材料既被承認為社會學知識的重要來源之一，同樣地，以社會學擅長之分析技術應用於歷史資料上，亦開闢了「歷史社會研究」(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的新途徑(註一)。

以上所述，大略介紹了歷史社會學新近的發展趨勢。相對於西方史學界重新肯定「敘述」(narrative) 為任何歷史著作之核心原則，並全力結合詮釋與分析之長處，以建立「敘事理論」(theory for narrative historiography) 的典範(Iggers 1985:202)；歷史社會學可謂仍在嘗試如何使不斷累積的歷史知識能夠經過消化，而以更有系統的方式整合於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學模式之下。在這方面，此間尚較陌生的社會學者Nobert Elias曾率先提出過一套構想，值得供作參考。

## 肆、N. Elias的「文明化理論」

伊里亞斯出生於1897年，1925至1930年他由波蘭前往德國海德堡大學深造，師承 Alfred Weber 和 Karl Mannheim。其後以「宮廷社會——封建王國及宮廷貴族的社會學研究」論文通過教授資格審查。1933年為逃避納粹政權對猶太人的迫害，流亡法、英等地，而在1939年首次發表「文明的過程」一書，論述他的歷史社會學研究心得。此書於1968年重新出版，獲得很大的迴響，目前伊氏已被譽稱為德國學術界仍然活著且影響最大的學者(黃萬盛1988:4)，一群荷蘭學者更以推廣他的思想為職志，儼然有成立一門學派之勢(Gleichmann 1977)(註二)。

伊氏認為，由派深思(T. Parsons)所精心架構的結構功能論，過度忽略了社會變遷乃是連續不斷的動態過程，而以類似「模式變項」(pattern variable)的抽象分析方式並不足以掌握這一過程的複雜成因及內在動力，我們因此迫切需要一套更能深入淺出來探究社會發展軌跡的理論觀點(Elias, 1978:225-230)。就西方社會而言，伊里亞斯選擇了「文明化」(civilizing)概念作為貫穿數百年，廣泛牽涉到西方人自我心理、行為方式、人際關係和國家制度起伏變化的總稱，並從個人與社會辯證互動所塑造的「形態」(figuration)角度切入以闡明由封建演變到現代社會的關鍵機制。所謂「形態」，意指群體共同遵循的行為表現規律，如同流行舞步般，可看做社會成員自然學習而與時遞變的某些準則(ibid:230)。從中古時代的宮廷禮儀逐漸受到市民階級模仿，一直到社會大眾在行為舉止上普遍接受「自我約制」式的合理化控制(如餐桌規矩、交談禮貌、清潔習慣等等)，莫不能解釋為「文明」在行為層次的內化過程。另一方面，現代國家的形成與中央集權政府對稅收與公權力(軍隊、警察、法院)的有效壟斷有直接關連。伊里亞斯在「文明的過程」第二冊詳盡地描述歐洲民族國家在社會佔有和交換關係(如土地、財產制、貨幣經濟等)上逐步集中權力的歷史經過。但同時由於政治、經濟領域的分工愈益複雜，因此社會各部門的依賴愈益明顯

，西方的經驗是當壟斷的權力成爲重要的協作和調節機構時，權力亦必不得不分散到更多的參與者手中，而民主政治的產生，標幟著國家之壟斷朝向匿名化發展，終至擴散爲「公共壟斷」（Elias 1982:109）。

爲了闡明他自己長期以來堅持的立場，伊里亞斯特地在「宮廷社會」的導論中檢討了社會學與史學的關係。他指出歷史學者一貫強調事件的獨特性和不可重覆性，但卻缺乏一套可以解釋行爲理由的系統化參照架構（systematic framework of reference）。其弊端便是各個特殊現象之間的連繫常被任意地詮釋，使得歷史研究的工作少有真正的持續成果（1983:4）。至於社會學必須自覺到這一份責任，努力從歷史的和經驗的資料中分析人類社會種種「形態」的構成與變化，以期更靈活地掌握社會角色間既規律又因應於個別狀況的互動過程（1983:32）。就在不斷充實和修正吾人對於「形態」的知識上，社會學和史學可以尋找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

總之，伊里亞斯結合心理學、民族誌、史學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融鑄出包括理論、概念、假設與經驗檢証的歷史社會學完整構想，並從行爲和制度層次綜論「現代文明」表現出的特色，頗具洞見。雖然「文明化理論」仍有若干問題尙待解決——如伊氏擬以「經驗類型」（empirical type）取代韋伯的理念型，其方法論依據和可行性究竟如何？又如他大量援引佛洛伊德心理分析式的解釋是否妥當？——但近年來其所激發的討論熱潮，無疑地是推動歷史社會學研究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 伍、結語

回顧人類文明的整體成就，二十世紀展現出最輝煌的一面，卻也是人類生活秩序變革最爲劇烈的時代。除了科技知識的不斷增進與應用外，人們對於己身所處社會的關切，端賴社會科學提供更精細的思考資源，方足以應付現代世界「理知化」趨勢之需。照韋伯的說法，這種「理知化」（intellectualization）不僅僅表現在技術的理性計算上，整個學術的進步也正是此一過程最重要的一個部份（韋伯 1985:128）。學術知識的網愈織愈密，即便是「既往」的歷史亦須隨著新問題和新觀點的湧現而開放給各式各樣的詮釋角度——畢竟歷史彰顯的並非自然時間，而是能賦予行爲或事件意義的「人文時間」（Humane Zeit）：在人文時間的脈絡中，藉著處理紛雜的變遷經驗，人們試圖知道自己在哪裡、將往哪裡去？（胡昌智 1988:24）。雖然歷史社會學有賴充份的史料與社會學特殊觀點的密切配合，真正成功的佳構仍是鳳毛麟角。但從韋伯和伊里亞斯作品中透露的人文關懷來看，他們的研究扣緊著歷史巨流的方向，創造出結合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統一圖景。或許歷史社會學這一份人文時間的向度，多少補充了一般社會學實証研究局限於短期的缺憾，也有助於社會學本身對「變遷」現象進一步的瞭悟與解釋。

## [ 註釋 ]

- (1) 據 Clubb/Scheuch(1980)所編的「歷史社會研究」一書，將社會科學「量化」技術應用到歷史資料上的範圍大致包括：行政與普查資料分析，生命史(lifehistory)及集體傳記(collective biography)，檔案內容分析，時間序列及網絡分析(network analysis)，社會會計( social bookkeeping)及跨國比較資料運用、長期趨勢分析等。
- (2) 伊里亞斯除了在歷史社會學方面建立起權威性的影響力外，其研究重點尚包括文化社會學、知識社會學和科學社會學等相關領域。英語世界對他的評價，可參見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84)編集之「伊里亞斯專號」。

## 參考書目

- 李弘祺(1981a)：歷史主義的危機與超越，史學評論1：41-70。
- 李弘祺(1981b)：從社會科學到社會整體歷史，史學評論3:39-78。
- 章英華(1983)：歷史社會學與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中國社會學刊7:215-234。
- 韋伯著，錢永祥編譯(1985)：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允晨，台北。
- 胡昌智(1988)：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聯經，台北。
- 朵伊森著，胡昌智譯(1986)：歷史知識的理論，聯經，台北。
- 馮爾康(1988)：中國社會史，谷風，台北。
- 翟本瑞(1985)：歷史認識與類型學分析，史學評論10:77-120。
- 黃萬盛(1988)：危機與選擇，上海文藝，上海。
- Aron, R.(1984)：Politics and History , New Brunswick/London.
- Bendix, R.(1978)：Kings or People , Berkeley.
- Chirot, D.(1985)：The Rise of the West , America Sociological Review 56(2):181-195.
- Clubb, J./E. Scheuch (eds.)(1980)：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Stuttgart.
- Eisenstadt, S.N.(1987)：Macrosociology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 Some New Direction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6(5): 602-609.
- Elias, N. (1978)：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1; The History of Manners, N.Y.

- , (1982) :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2 : Power and Civility, N.Y.
- , (1983) : The Court Society, Oxford.
- , (1987) : The Retreat of Sociologists into the Present.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4(2):223-247.
- Gleichmann, P. and et al. (eds.) (1977) : Human Figuration : Essays for Nobert Elias, Amsterdam.
- Iggers . G. (1985) :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London.
- Kaye, H. (1984) : The British Maxxist Historians, cambridge.
- Kocka, J. (1986) : Max Weber—der Historiker, Gottingen.
- Rusen. J (1982) : Ursprung und Aufgabe der Historik, in: Baumgartner H./J. Ruseu (Hg); Semina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Frankfurt.
- Schluchter, W. (1981) : 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Berkeley.
- Skocpol. T (1979) :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84) : Special. Issue on Nobert Elias, Vol.4.
- Weber, M. (1949) :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 Glencoe. Ill.
- Zingerle, A. (1981) : Max Webers Historische Soziologie, Darmstadt.